

敦煌两关丝路杂谈

——以阳关博物馆成立五周年暨《敦煌诗选》出版座谈会发言为中心

初世宾

(甘肃省博物馆, 甘肃 兰州 730050)

[摘要]玉门、阳关的得名与输玉无关,二者的地位、作用尚存一些不被注意的差异和奥秘。先秦文献《穆天子传》保存有许多前丝绸之路和敦煌地域地理、人文、交通的重要信息。敦煌一称,不是月氏(吐火)的汉译,东汉应劭释边疆盛大是正确的。本文重温河西四郡、两关与西域、丝路的开拓创建史,就一系列重大问题及研究,作出了新的分析、判断。

[关键词]敦煌;玉门关;阳关;西域;交通;地理

[中图分类号]K928.77 [文献标识码]A [文章编号]1005-3115(2009)08-0005-10

一

两关之义,阴阳并列。阳关在南属阳,后世谓道路宽敞平安而称引曰阳关大道。史家明言其在玉门之南,故名,但未云玉门何义?其实可反向推论,玉门在其北属阴,以玉喻阴,因称玉门,与输入玉石无关。

秦汉尤崇尚阴阳五行,地名上颇遗其痕迹。秦五原郡、北河有阴山、阳山;汉初桂阳郡置阴山、阳山县。汉武帝一生笃信神仙阴阳,其西北开疆拓土,列郡建关通西北国,探昆仑,求天马,直至晚年,迷信不减。西域开通,诸国广大,中外使客频繁。汉于敦煌西北、西南建两关,犹若国门都阙,颇有布置安排。依五行八风(四仲四维说),玉门当中央土的戊位,卦象乾,为天门;阳关则当中央土的己位,卦象坤,为人门。此与宣、元时都护总领南、北道,戊己校尉“位居中央,镇抚四方”的构思正相吻合。^①对西域而言,敦煌也处于五行中央土的戊己位,故敦煌太守可操控两关,还可代朝廷节制西域都护、戊己校尉事。东汉末应劭说“敦煌”是盛大之意,并非无稽之谈。

玉门输玉说,始于英国斯坦因和日本桑原鹭藏,^②但玉门之最初命名因玉石输入是很值得怀疑的。至少阳关也是玉的输入途径,昆仑、和阗之玉由阳关进入亦更便捷,为何不称玉门?可见其说缺乏理由与证据。

二

说到玉的输入,须提及先秦典籍《穆天子传》所述周穆王西狩会晤西王母的路线。据近现代古地理研究

的权威注释,^③穆王由洛阳或关中赴内蒙、河套,复西南入青海,经乐都、积石山等地西去,约由塔里木盆地南侧,缘昆仑山系西至“群玉之山”(今和田、叶城),“攻其玉石,取玉版三乘(车),玉器服物,载五万只”。然后北征“剗闾”(伊犁),会西王母于“玄池”(伊塞克湖或斋桑泊)。

这是前丝绸之路时期有记载的最早一次中西交通大事,时当公元前1000年。此奇特路线所以吸引人们关注,是基于以下几点:

(一)穆王统率大队车马扈从西进,其路线忽北忽南、迂回曲折,有多段道路与后世丝路的某些路段颇为吻合。例如中原去漠北之路;蒙古草原南侧贯通东西之路;由阴山、河套南下——北方民族进入中原通途之一;又由此道继续沿黄河、湟水西南贯通今青海省之古“羌中道”,再入新疆“西域南道”,并从其西段北上“西域中道”,复逾天山而抵伊犁河流域。这一路线甚不畅通,像是一次“探险之旅”,边行边探寻路径,带有早期交通的特征。有些路段有意回避,似不能或不便通行。众所周知,西周的北方、西北有强敌犬戎(又称鬼方、鬼戎、昆夷、玁狁),穆王此行之曾与犬戎翟王激烈战争。关于西王母这一西方神秘女性,中国古史神话传说中,有华山骊戎、青海须抵池王母石室、酒泉南山西王母宫、新疆天池、于阗昆仑县圃诸说,但以此传最为可靠。它应当是哈萨克斯坦东南部草原古塞种人著名的母系氏族女权部落。^④

(二)穆王西巡,是一次大规模的和平友好外交活

动。这种和善友邦之举,在以后历代处理国际关系、民族问题时,一直见到它的影子,被奉为准则和传统。穆王西去携带的是金银珠贝、药材器皿、车辆舞乐等,带回贵重的玉石琅玕、毛皮牲畜。这是一份典型的草原骑马民族与中原农商地区之间互赠礼品的奉仪。

(三)这次旅行的往返均经过敦煌地区,过去的研究对此有所忽略。《穆天子传》记载去程的“乐都”、“积石”到“昆仑丘”、“群玉之山”间,过一地名“居虑”,“居虑献酒百□于天子”。岑仲勉认为即“居庐訾”,在罗布泊的东北岸,地当两关赴楼兰道中的要害。悬泉汉简有宣帝时破羌将军辛武贤出军敦煌,欲通渠居庐訾仓、进击乌孙的记载。黄文弼于1929年发掘该地,出土汉简有“居庐訾仓”,隶属于车师戊部校尉,知其地与西域都护、戊己校尉、伊循校尉的密切联系。敦煌至罗布泊是中国西部的交通枢纽、十字路口。自青海羌中西去西域南道,必从今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一带逾阿尔金山的当金山口,北上敦煌,再出两关赴南、北、中诸道,汉、晋、隋、唐莫不如此。穆王回程同样。《穆天子传》曰:离开玄池东行三个半月,抵达“重𪚩氏”领地“黑水”,又过“长沙之山”、“文山”、“西膜”和“巨蒐氏”地。顾实、岑仲勉一致认为“长沙之山”乃焉耆南之库鲁克塔格沙山,“文山”在哈密西。顾氏又说“西膜”为哈密;吕思勉以为即“塞”;而岑氏说“巨蒐”为“渠搜”,在酒泉、若羌之间。诸家于“重𪚩”皆无解。按,后一字为古文,从邕当读如邕,即唐宋时期之“种𪚩”、“仲云”、“众熨”,为小月氏种,分布于敦煌以南、阳关外和若羌一带,见载五代高居诲《使于阗记》、宋王延德《西州使程记》及《宋会要辑稿》蕃夷拂菻条等。亦即《汉书·西域传》、《赵充国传》之“婼羌”、“狼何羌”诸种,乃大月氏西迁所遗避入南山依附羌人的小月氏。《穆天子传》又云:“重𪚩氏之先,三苗氏之□”;“重𪚩之民,铸以成器于黑水之上”,说其人先祖源于三苗,善冶铸。《汉书·西域传》曰婼羌“山有铁,自作兵,兵有弓矛服刀剑甲”,与重𪚩十分吻合;也与古说窜三苗于三危,允姓之戎居瓜州,黑水入敦煌三危南,以及乌孙、月氏居敦煌、祁连间等,均可相互印证。黑水应指东起敦煌、西抵若羌以南,特别是南流的水系。可见穆王东返再次经过敦煌、罗布泊地区,并与重𪚩(仲云)诸族密切接触交好。

敦煌之信史往往从汉武拓疆建郡开始,今从《穆天子传》又知其先秦时地理、人文、交通的一些重要信息。公元前1000年,敦煌一带即是中原通西域的要道,并连接漠北草原道与祁连山南麓的羌中道。后来,张骞探

险至大夏,逾葱岭,缘昆仑山诸羌氏小国向东,欲从羌中返长安,在罗布泊一带再次被匈奴捉获,所循还是这条古老而复杂的民族走廊。敦煌特殊的地理、人文条件早已决定它后来在丝路中的地位。朝廷对它的开发、经营又大大提升了这种价值。《后汉书·郡国志》说“华戎所交一都会”,指的是建郡以后。而早期敦煌应是西部少数民族的聚居地、交汇中心和迁徙通道。因此,应强化大敦煌地域的原始、青铜时代考古与民族学研究。这一阶段历史几乎等于空白,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。应当凭藉如悬泉置那样的新发现,重现早期敦煌历史的辉煌。《穆天子传》是西晋武帝时河南汲县魏安釐王(前276~252)墓中出土的一部竹简文书,距今已2200多年,足可相信。当然,历史记载有时也不免失实,需要具体分析,不可一概臧否。正如前述,包括《穆天子传》在内的早期敦煌的历史、艺术、考古课题和疑问还不少。如三苗、允戎、重𪚩氏、居虑和黑水、长沙、三危各属何族、何地?乌孙、月氏的族属,是敦煌原住民,还是后迁入的,与西域古乌孙、月氏文化有何异同?自河西到新疆普遍发现的“伏羲、女娲”和“东王公、西王母”信仰,与穆天子西游,和丝路文化传播有无关系?如此等等。在积极研究敦煌汉唐盛世的两关长城丝路文化和简牍学、敦煌学的同时,还应把关注兴趣扩大到前敦煌时期,改变目前这一时期研究的冷清局面。^⑤

三

敦煌一称,不见于《穆天子传》,也不见于所有先秦典籍与所知文物。即使《穆天子传》为伪托之作,时代也不会迟至战国中晚,去秦末汉初月氏据敦煌时未远,为何只有“重𪚩”而无“敦煌”之名?所以说“敦煌”为当地“土名”;^⑥或曰是“月氏”胡音(吐火罗 Tokhri)的汉写,^⑦理由皆嫌单薄。后者拿5、6世纪甚至更晚的中亚语言,比对前二世纪的汉语音,更为严谨学者所诟病不取。^⑧所谓月氏为吐火罗(睹货罗、兜佉罗)的主要依据,是鸠摩罗什译《大智度论》(405)注“兜佉罗”国曰“小月氏”。所指乃中国月氏西迁大夏贵霜朝西北印度吐火罗地区后,5世纪前半月氏王寄多罗再西迁,故地由其子统治,故史书吐火罗之月氏有大、小之分。大夏的月氏人、吐火罗人本是两码事。5世纪吐火罗的小月氏与600年前中国敦煌祁连间的小月氏更是风马牛不相及。所以,根本不存在将“吐火罗”译写作“敦煌”的可能。此点,中外学者已多作论证。^⑨其次,在月氏人曾活动过的地区,例如新疆的罗布泊、吐鲁番、焉耆、库车一带,也

曾发现过所谓“吐火罗语”古文书(我国称焉耆、龟兹文,使用西北印度婆罗迷文的字母拼写),时代晚至4~9世纪。又可疑之处有二:一是这种文字的全部材料中,没有“吐火罗”(Tokhri)一词;二是吐火罗语属欧语系,是从西北印度吐火罗地区传播到新疆。而大月氏乃自东向西迁徙,语系当与之不同。很难证明在甘肃的月氏操吐火罗语。

又或寻找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中早于建郡即出现的“敦煌”,来反证它是原名和少数民族语言。此种间接推论方法并不科学;又敦煌建郡时间迄今尚无定论,缺乏准确坐标,无所适从;再者史家追述而藉用晚出地名是正常的。何况所例举者,无一例可确证在建郡前便已存在。^⑩同理,“祁连”虽是胡语,但并不能证明与其并列之“敦煌”也是胡语。

敦、煌二字真义,史、汉注家皆无歧说,均以应劭注为是,曰:“敦,大也;煌,盛也;敦音屯。”唐人犹宗其说,李吉甫《元和志》曰:“敦,大也,以其开广西域,故以盛名。”又唐初司马贞《大宛列传》赞云:“旷哉绝域,往往亭鄣。”皆得应注真谛。又《水经注》卷2湟水条引《释氏西域记》称敦煌为“屯皇”。应注敦音屯,敦、屯皆指军事集聚屯守。秦汉律令有《敦表律》,^⑪敦同墩,指烽火台;军队、边塞有敦长、屯长,相当于亭长、燧长。魏晋以降,敦煌作墩煌,墩同敦、墩,即烽火台。

日本藤田丰八最早主张“敦煌”是古希腊地理学家托勒梅《地理学指南》中的“睹货罗”(Thagura),责难应劭注乃中国好以字义解释一切地名之“癖习,不足采也”。^⑫其论偏颇,不可不辨。按汉字必具形、声、义三要素,并可因形、声求义,正是其优越处。以字义解释语言词条包括地名,也是中国文明、文化的特点之一,并非“癖习”。应劭博学,谙习典章制度,又去西京未远,不会不知边疆地域有民族、外国语言译音问题。颜师古注汉书,颇多征引应说。应氏凡遇异族语言,一般皆直注其音,或明言系某国、某族云云。例如《汉书·地理志》应注:“犍为郡为故夜郎国;犍道为故犍侯国;越巂郡为故邛都国;牂牁郡故且兰为故且兰侯邑;漏卧为故漏卧侯国;同竝为故同竝侯邑;夜郎为故夜郎侯邑;句町为故句町国。”金城郡枹罕为故罕羌侯邑,枹音扶;安定郡朝那为史记故戎那邑;雁门郡楼烦为楼烦胡地;元菟郡为故真番、朝鲜胡国;高句骊为故句骊胡;乐浪郡为故朝鲜国,如此等等,汉、番族属与语言的区分十分严谨。其他注家亦如此。也有不知所以然或意见不一者,一仍其旧;或存疑,不作强解。藤田之说,以偏概全,不足论也。

应劭注边郡地名,异族领地以族称命名为一类;取典故、名胜命名如金城、酒泉为一类;再一类如安定、武威、张掖、敦煌,与西部的斥土拓疆和战争、边戍事关联。安定谓边郡靖绥,武威乃宣扬军威,张掖为张国掖臂,敦煌则指疆域盛大,其立意与其时其地其事相一致,令人一目了然,显非偶合。汉语言之地名,同汉式命名习惯,从古、从地、从姓氏、从人、从事、从物……据文解义是准确的。如敦煌郡的渊泉县因多泉水;冥安县因冥水、冥泽;广至县之地又可北出昆仑,南通羌中;效谷县因屯田致谷,皆汉式命名。惟龙勒县无解。武帝元狩四年,卫青、霍去病远征漠北匈奴单于庭,过龙勒水,当属匈奴、羌胡语。汉语史籍地名凡无法据文解义者,多数为异族语言,且其翻译颇为规范。《汉书·匈奴传》既然已明言匈奴语“天”为“撑犁”,颜师古就不该再把“祁连”注作天山。同理,有学者说《水经注》卷2引《山海经》,云西域有“敦薨”之山、水、渚、浦、薮,最终流入盐泽,主张“敦薨”即敦煌,二者分别是战国、汉时对“吐火罗”的不同译写。前文已述月氏自东向西入大夏(巴克特里亚)统治吐火罗地,二者始发生混合。印欧语系的吐火罗语言文字,则是3世纪以后从西北印度传入西域中道。说吐火罗人和语言文字早在战国时期就生活在新疆和甘肃,至今殆无任何证据。又“敦薨”之地即今天山中部东南开都河、博斯腾湖与孔雀河上游,亦即汉时焉耆、渠犂、尉犂、危须诸国地,为西域都护治区,但汉时文献绝无敦薨之说。酈道元注水经,敦煌、屯皇、敦薨三者分别清楚,如果敦薨即敦煌,何无一字言及?又其黄河源出印度、西域的部分,将《山海经》的神怪荒诞杂驳,与新获佛教、印度史地知识等混糅一起,最为迷离失实。汉时学者已视为方术之书,不属信史。司马迁《史记·大宛列传》论曰:“九州山川,尚书近之矣。至禹本纪、山海经,所有怪物,余不敢言之也。”《汉书·张骞传》班氏赞亦斥之;如淳注:“放荡迂回,不可信也。”颜师古同意如淳的意见。而酈氏所引敦薨之地,比《山海经》更加夸张放大,是以不取。

西汉郡国一百零三,名称绝大多数为汉式。仅有犍为、元(玄)菟、乐浪三郡例外,似异语译音。犍为名曰建元六年置郡,实则并未控据其地,相当长时间内处于“自保”状态。元菟、乐浪地在辽东边徼之外,类似西域蕃属,故仍称原名。由知汉时不以异族语言名郡国。异族所居县道则不拘此格,一般仍保留其民族原名不改。敦煌自酒泉郡分出新建,不当再以民族语言命名,此视敦煌郡军政县乡亭里多汉式名称即明。当然,民族地域

名还是有的,例如龙勒即是。

四

元狩二年(前121)霍去病河西之战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战略进攻的典范之一。此战莫立了我我国现今国土的基本版图。战事倥偬,河西来归急促,一切草创,故四郡建置年代和最初的开发,未留下准确史料。司马迁作为当世史官,其《史记》亦无一语明确四郡各建于何年(武威郡除外),需读者自行推算。《史记》为刑余之书,未能尽善,尤其是武帝朝之事,不可责难。后来的班固欲为订补缺失,然而时过百余年,疏误难免。《汉书·武帝纪》、与《汉书·地理志》并存异说,自相矛盾,又不明依据,是存疑以待来者欤?总之,根源在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的先天不足。后世学者重作探讨,各有分析理解。于是歧议纷乱,疑窦丛生。据不完全统计,仅敦煌建郡年代即有九家之多,令人无所适从。

本节试就此再予审视评述。提倡正确读史,合并、减少分歧。先简述诸家有关敦煌建郡年代如下:

1.元鼎六年说(前111):张维华1942(发表年限,下同)、向达1944、夏鼐1948。

2.元封四、五年说(前107~前106):陈梦家1965。

3.元封五、六年说(前106~前105):吴弼骧、余尧1982。

4.太初元年(前104):黄文弼。

5.太初元、二年(前104~前103):刘进宝1991。

6.太初中(前104~前101)或稍后:劳干1944。

7.天汉三年左右(太初后至太始三年前,前100~前94):张春树1967。

8.天汉二、三年至征和二年(前99~前91):方诗铭1947。

9.后元元年(前88):施之勉1950、刘光华、王宗维1986。^⑬

《汉书》中记载四郡设置,《武帝纪》曰元狩二年立武威、酒泉郡,元鼎六年再分置张掖、敦煌郡。《地理志》则云太初元年开张掖、酒泉,四年开武威,后元元年从酒泉分出敦煌。此二说虽甚抵牾,但与《史记》比较,先建酒泉或再加张掖,敦煌是从酒泉分出,武威晚出;这三点是共同的,可见《汉书》二说也有其合理性。

司马光《资治通鉴》载:元鼎二年建酒泉郡,是第一个敢于否定班固元狩说的,张春树称其“甚具卓识”,颇是。先业师张维华1942年也是梳理了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中有关建郡的所有资料,用反证、互证和辨理的方法,

力证酒泉建郡当在张骞出使乌孙归来,即元鼎二、三年间,张掖、敦煌元鼎六年建,可信。武威建郡仅见于《汉书》,据记载排比当在昭末宣初即元始六年至神爵元年间。劳干1944年继之提出酒泉、张掖同武纪,敦煌建于太初伐大宛时,而武威郡可用汉简排年的方法锁定在元凤三年到地节三年。此二家是研究河西建郡纪年的功臣,其方法常为治史者效仿,虽有小疵而无伤大雅。

其间,玉门关之设立、位置、隶属,直接关乎敦煌建郡。先是法国沙畹1913年据《史记·大宛列传》汉武帝“使使遮玉门”阻止贰师将军罢兵返回的一段文字,发明太初时玉门关在敦煌以东的新颖观点。^⑭假如当时敦煌还在玉门以外(西),它是否建郡就值得怀疑了。故向达1944年、夏鼐1948年相继著文反驳。二者皆主张敦煌建于元鼎六年,而玉门关或更早一些,位于今小方盘城,关址从未迁移过。沙氏观点影响学术界半个世纪,为此向达不得不解释“遮玉门”是遮敦煌东之玉门县而非敦煌西之玉门关。劳干本主张元鼎六年说,但又惑于沙氏说,将敦煌建郡屈从于太初伐大宛稍后,说今玉门关是伐宛胜利后从赤金峡西迁过来的。这些当然都是错误。

重温以上早期对敦煌建郡的研究,颇予人启思。随后的探索更为大胆、解放,形成一股新潮流。但今天重新审视元封、太初、天汉诸说,诸家似乎存在一个未能正确解读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文字与其所述史实的问题。

《史记》章句笔法多边叙边议,一般是先早后晚、由远及近,但特例也不少。关于河西的战争、筑塞、移民和建郡等交织复杂的情节,《史记·大宛列传》按以下三次重大事件,即:元狩时击降河西,元鼎、元封之际通西域,太初伐大宛为中心,综合史实,横向铺陈,归纳议论的。所以,其文字不能死板理解,行文次第不一定代表早晚,其间还有追溯、倒叙、插议、预测、综述等,须用心领会分析,不可拘泥于字句方寸之间。《汉书》惟《史记》是瞻,有关本题的绝大部分是照录《史记》,无阐述发明,个别的或有删减、改增、概括,可由其异同发现问题。

《大宛列传》叙三大事件自元狩二年至天汉初共3400余字,然而筑塞建郡事,分别在三大事件之末尾,仅只列述以下三句话:

1.元狩击降河西一章结尾:“而汉始筑令居以西,初置酒泉郡,以通西北国。”

2.元鼎、元封通西域一章结尾:“于是酒泉列亭障至玉门矣!”

3.太初征大宛一章结尾:“而敦煌置酒泉都尉,西

至盐水,往往有亭;而仑头有田卒数百人,因置使者,护田积粟,以给使外国者。”

以上三语既是记述具体史实,也是每一事件之概括性结语。写在时间终了处,却并不表示发生于事件终了之时,至少史迁无此意,细心品味即知。原文“而”、“于是”,没有“从此”、“此后”等意。如释“同时”、“这样”之类,倒较符合原文精神。诸家正是据此三语之上下文时间排比,得出元鼎六年筑令居、置酒泉郡,元封四、五年筑亭障至玉门,太初四年后筑亭至盐泽的结论,演绎出元封、太初、天汉说。其实不然,其中有对文字和史实的误解。为此特以《大宛列传》为中心分段剖析于下:

(一)元狩击降河西地空徙民屯田

《史记》大宛等各传,元狩二年骠骑三出河西,重创匈奴右方,降昆邪二王号称十万,全部迁移置五属国。四年又大出漠北击匈奴王庭,从此金城以西至盐泽空无匈奴。同年张骞出使乌孙,厚币赂招其东徙昆邪故地,与汉结昆弟共御匈奴,更可招来大夏等为外臣,惜无结果。此段文字和史实,以下几点需再论及。

1.汉对河西方略的改变

元朔二年汉收复河南,曾立即筑城建朔方郡,而河西与之不同。一者,张骞建议清除匈奴,请来乌孙,以其为桥梁交好西域。此方略就军事、战略与历史经验而言都是败笔。其次,疑攻占河西时即有建郡计划。《汉书·武帝纪》纪言:“元狩建武威、酒泉。”《史记·平准书》云:“初置张掖、酒泉郡。”恐非空穴来风。计划或因张骞出使而延缓,直至外交努力失败时方再启动。劳干、向达以为汉书武纪之说不可轻易否定,有一定道理。

2.元狩时向河西徙民、屯戍

过去或以为元狩时徙民实边无河西,非是。《史记·匈奴列传》载:“汉已得浑邪王,则陇西、北地、河西益少胡寇,徙关东贫民处所夺匈奴河南、新秦中以实之。”元狩四年“汉渡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,往往通渠置田官,吏卒五六万人,稍蚕食地接匈奴以北”。又《平准书》云:徙之民“七十余万口,在食皆仰给县官”。集解裴驷引《汉书·食货志》称新秦中在朔方南。实则秦中指关陇,新秦中乃新夺匈奴地即北地、陇西近河之安定、金城、榆中、令居等,河南则指朔方、五原。《汉书·武帝纪》有载,元狩五年,“徙天下奸猾吏民于边”。以上足证元狩时河西已设军屯田官,以军卒、贫民、谪吏徙,来开渠垦田积谷供应军需。这是最初的汉人居住点。

3.军事与民族建置

河西新开,虽无匈奴,但有守军驻扎;原住民如南山羌、小月氏等仍被保留。后者主要分布于祁连南山,代表是卢水胡,两汉时乃张掖属国的主力,后来扮演了很重要的历史角色。匈奴降众编为五属国是当务之急,接下来便应成立张掖属国安置小月氏,不过被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所遗漏。据兵法,凡行军作战、军队营阵、辎重粮秣、警讯斥候当同时并举。未建郡之前的军事布置今已不可知。可以想象,约同《赵充国传》“部曲相保,堑垒木橛,便兵弩,飭斗具,烽火幸通”的一番景象,张骞出使乌孙经过河西,当有驻军护卫迎送。

4.霍去病元狩二年进击路线和河西民族分野

此问题为中国西部古史地重大课题之一,也与河西建郡甚至历代建置有密切关系。前后有六说。一是日本藤田丰八,路线是北地—富平(银川)—阿拉善—居延(额济纳南下)—祁连山—湟中。^⑮二是岑仲勉攻天山说,他延长藤田氏路线,由居延西击祁连(天山),即攻入新疆东部。^⑯三是王北辰的阴山高阙沙漠道说,北地—富平(银川)—朔方高阙—乌兰布和、巴丹吉林—居延(南下)—祁连山—麟得(张掖),近似藤田的路线。^⑰上三家皆夏天进军路线。四为吴初骧之青海羌中扁都口说,即陇西狄道(临洮)—黄河—湟水—浩亶水(大通河—达坂山、扁都口—民乐、张掖)。^⑱此为春天路线。五为王宗维乌鞘岭道说,即由今兰州而武威的兰新铁路、312国道进入河西。^⑲六即拙说,据居延、悬泉汉简驿置道里资料,^⑳与史、汉武帝褒扬霍去病诸诏书,测定路线为春、秋自长安出陇西萧关,在汉媼围(景泰芦阳)渡河,经居延等地进入走廊。夏天由中宁渡河沿腾格里南缘西向民勤、武威。其中,古居延在武威以东而不在额济纳。^㉑

以上诸说因篇幅关系无法展开,但可知其进入河西的途径、路线、目的地,以及所据史料、方法各异。

(二)元鼎、元封建郡通西北国

对这段河西建郡通路的重要时刻,《大宛列传》的记述比较紊乱,述议参半,时间概念或清晰或模糊,颇需考订推测。现按我们的认识、方法,依其次第给予概括、摘引、分析,表解如下:

1.元鼎二年,张骞与乌孙使者、良马来归报谢,乌孙决定不东徙。拜骞为大行,掌蛮夷、外国事。

2.三年,骞病故;四年骞使乌孙诸副使使大宛等八国及旁国,与其国人俱来,“于是西北国始通于汉”。(《汉书·张骞传》无此)

3.史迁论博望侯及其后继者颇有威信(所指事在

元狩四年与元鼎四年之间)。

4.元鼎三年乌孙惧匈奴击之,使汉献马求聘公主,朝廷公卿议决应聘。

5.初,天子《易》占神马从西北来(约元狩末);得乌孙马名天马(约为元鼎二年);得大宛马再名天马(当在太初四年)。

6.“而汉始筑令居以西,初置酒泉郡,以通西北国”,益发使抵安息等五国。

7.史迁概述使团规模、批次、往返时日。

8.汉灭南越,通西南夷欲至大夏无望而止;通大夏者多由北道从酒泉(元鼎六年至元封二年)。

9.史迁论“汉使”。

10.楼兰、姑师当道攻劫汉使,匈奴奇兵时时遮袭汉使,汉使屡言楼兰、姑师易击。

11.元鼎六年,赵破奴“将属国骑及郡兵数万巡击匈奴。元封元年,破奴、王恢虏楼兰王,击破姑师;元封三、四年,分别封侯。

12.“于是,酒泉列亭障至玉门矣!”

以上将这段有关河西建郡最详尽的文字,细分为12小节,以便比对前后左右,理清年代。其中,3、7、9纯属议论,10与具体年代无关,所余只有6、12不确定和无从比对。实际上,史迁没有说清“筑令居”、“置酒泉”究竟在何年。如果按诸家的方法,这一事件应发生在1、2、3、4、5、8何后何前?是一年还是数年间?实在无法遽断。同样,12的“列亭障至玉门”,应与11三个年代的那个衔接比对才为合理。可见诸家所谓元鼎六年初置酒泉郡,元封五、六年敦煌建郡的推论,不仅缺乏《史记》的依据支持;即就记载的排年分析而言,也不应得出如此结论;更何况其结论尤悖事理。

以下略谈我们的理解:

1.元鼎二年筑令居以西

元狩时已向河西、令居徙民置田官,元鼎二年筑令居以西当无疑。陈梦家认为令居最初泛指武威东至黄河之地,^②说是。其实,令居得名于“依令徙居其地”,见《汉书·晁错传》上书言守边备塞:“募罪人及免徒复作,令居之。”即依法安置,享受优待。其地乃河西走廊东段,^③连阴山、河湟羌胡,扼东西交通要冲,绿洲沃野,极具军事、交通、经济价值。故张骞归来重新启动建郡计划之同时,立即筑令居及以西,作为开发河西之桥头堡。

筑令居以西,是全面系统的建设开发,或可说是内郡形态的复制。包括军事防御的城郭烽塞和关隘长城,行政民事的郡县城邑、乡市田舍,水利交通的渠井河

堤、道路驿亭等等。不少学者把这简单化地理解为元鼎六年筑塞、长城至酒泉。^④陈梦家较谨慎,提出从元鼎二年筑至六年。^⑤

《水经注》卷2湟水支流洴水条云令居县“汉武帝元鼎二年置”。上距元狩时徙民置田官已数年,建设和建置诸般工程、体系应有基础,完全可信。是元鼎二年河西东部已建县,建郡也当在计划之中。

又《汉书·霍去病传》元狩二年夏败昆邪、休屠王,大行李息即“将城河上”。其城当在后来安定、武威郡相交地黄河附近,早于令居,用作驻军或迎降匈奴,也是汉军在河西的最初据点之一。

2.元鼎二年初置酒泉(及张掖郡、张掖属国)

首先,《资治通鉴》建酒泉郡系元鼎二年。张维华说张骞返回、乌孙不东徙已成定局,河西不宜闲置,时中西交通已频繁,河西是惟一通道,亟待建郡经营,证成司马光之说,^⑥其论极是。此为汉河西经营方略从藩属制再向郡县制转折之标志。通西北国,保河西畅通,乃当时要务。汉武帝正准备以“远交近攻”对匈奴进行围剿打击。前引《大宛列传》1~10全部属外交和交通安全问题。将6定在元鼎二年是合理的。其前一节5,史迁叙得乌孙天马正是元鼎二年张骞归来时,这并非偶然,似切中史迁原意。如定为元鼎六年,首先与2、8、11诸节冲突,也不符合《史记》叙事体例。

其次,元鼎二年已立令居县,兼证河西及其东部已开始置郡。《汉书·昭帝纪》始元六年取天水、陇西、张掖三郡各二县置金城郡。金城郡之令居、枝阳当属张掖郡划入者。元鼎二年置令居县,或反证其时已设张掖郡。除此之外还另有三证:

(1)《史记·平准书》元鼎六年“击西羌。又数万人渡河筑令居,初置张掖、酒泉郡”。此与大宛列传颇异,亦是《史记》惟一处记酒泉、张掖同时建郡。元狩时已渡河筑令居,已见前,何竟迟至元鼎六年?故此年代不可信,乃将元狩时事误记为元鼎,但酒泉、张掖同时立郡,却不无可能。

(2)赵破奴元鼎六年率“属国骑及郡兵数万”,《匈奴列传》云出令居2000里,至匈河水,事又见《汉书·武帝纪》。郡兵,当指酒泉、张掖当地兵;属国骑,非张掖属国胡骑(小月氏、羌等)莫属。此时河西已开发多年,赵破奴岂能率它处郡兵属国骑远征河西?因此,此条可证元鼎六年之前已有酒泉、张掖郡、属国之建置。张掖属国与郡约同时建立,不晚于元鼎二年。匈奴为月氏世仇,小月氏依附羌人,入南山乃避匈奴锋芒。元狩二年夏,霍去病攻败小月氏之当时或稍后,可能就地招降,

建立张掖属国。赵破奴率之进攻匈奴、楼兰、姑师，乃是张掖属国见史载之最早者。此后，又屡见于《汉书·匈奴传》、居延汉简及《后汉书·窦融传》等，东汉安帝时犹存。《郡国志》仅言武帝置，而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失载。

(3)新出悬泉汉简及居延简的道路驿置资料，丝路北道(长安—固原—武威)、南道(长安—天水—兰州—武威)、河西道(武威—两关)三道交接处名曰“小张掖”，在今武威南谢河乡一带。两汉武威郡辖张掖县而治姑臧，张掖郡无张掖县而治麟得。此种奇怪的现象，表明张掖设郡在前，最初治所在小张掖。论位置、形势，小张掖确有“张大掖臂”之势。后张掖郡东部分置金城、武威二郡，郡治西迁麟得，而张掖县留存武威郡中。此点可旁证元鼎二年所建很可能是酒泉、张掖两个郡，一治禄福(酒泉)，在西；一治小张掖，在东。

汉书·武帝纪》元鼎四年，“秋，马生渥洼水中，作宝鼎、天马之歌”。注李斐曰武帝时谪罪人敦煌屯田于渥洼(即今南湖)发现神马献之。此证元鼎四年和以前，敦煌已有行政建置与屯戍组织。时酒泉已建郡，敦煌建置或隶属酒泉郡亦未可知。

河西建郡之同时，河东诸郡亦呼应配合。《汉书·地理志》元鼎三年又置安定、天水郡。二郡主要由陇西郡分出。《史记·孝武纪》褚少孙补：元鼎五年上至陇西，登空桐。《汉书·武帝纪》作“逾陇登崆峒，西临祖厉河而返”。证高平、崆峒、萧关原属陇西。褚先生宣帝时人，说可信。由长安经固原西出河西必由萧关。由长安过汧、陇去金城、武威时，过天水而不经陇西郡。故知安定、天水郡之设与河西建郡相表里，为汉代丝路的首次全面建设。过去研究张骞使西域、骠骑击河西之“出陇西”，习惯作从狄道(陇西郡治，今临洮)出发，不知自秦皇汉武以来，出陇西皆指自陇山(六盘山、关山)西出萧关。前引元鼎五年武帝登崆峒，循始皇高平故道(固原)西巡祖厉黄河之滨，即今景泰、靖远间。《平准书》复补云，元鼎五年武帝勒兵数万，出萧关，巡北地，猎于新秦中。陇西准备不及，北地千里无亭徼，太守以下皆获罪死。此后又九次巡狩萧关、安定、北地。其时河西初建，又多战事，故武帝西狩抵黄河为最远，始终未渡河而亲临河西。

3.元鼎六年敦煌建郡与玉门、阳关之设

前引《大宛列传》：“于是列亭障至玉门矣！”是肯定性陈述句，不能解释为：此后从酒泉筑亭障到盐泽。元封征楼兰、姑师以敦煌为基地，筑亭障乃为出征与防御袭击，故酒泉至玉门的烽燧长城和玉门关，最晚在元鼎六年、元封元年当已就绪。其间敦煌建郡不晚于元鼎六

年，与《汉书·武帝纪》、敦煌遗书《寿昌县地境》所记相合。

诸家又误在将修筑时间再推迟至赵破奴、王恢封侯(元封三四年)以后。不明史迁叙事常是“纪事本末”与“编年”交替运用，或将不同年代之事合并议论。此例，何年封侯与筑亭障毫无因果关系。《匈奴列传》：“是时汉东拔穢貉、朝鲜以为郡，而西置酒泉郡以隔绝胡与羌通之道。”朝鲜为乐浪郡在元封三年，酒泉郡早在此前。如此叙述，并不意味酒泉郡与乐浪同时或更晚。

劳干说玉门关在敦煌以东时尚无阳关。关隘为边徼疆界出入重地，建关徼、禁出入、备非常，历来如此。元鼎、元封时敦煌已经设建置、屯田、障塞、关隘。元封元年汉军以敦煌为基地西进至盐泽以西以北，控制楼兰、车师。而迟至元封五年障塞才从酒泉筑到“赤金峡的玉门关”，令人匪夷所思。如此赤金以西玉门、安西、敦煌皆属化外之地。因此，太初玉门关在敦煌以东说根本站不住脚。

(三)太初征大宛，打通西域道

两关以外盐泽、白龙堆和流沙戈壁的险阻，中道、北道匈奴势力的遮袭，皆因楼兰、车师战败而暂时缓解，从此又揭开了汉匈争夺西域的序幕。西域诸国或与匈奴结盟，或犹豫于强势之间。故武帝用金马换天马的努力失败，遂于太初元年发动了大宛之战，企图用武力威慑推动其联通西域，孤立、围攻匈奴之策略。《大宛列传》对当时的描述是：安息、犁轩来献大鸟卵和眩人，汉于京师、海上大宴外国使客、耀富夸强，甚至访昆仑、探河源等壮举，汉在西域、西北国的声威可谓空前。然而始料未及，武帝低估了征大宛的难度，更遭到朝野反对，致有二次伐宛，变成了一场政治博弈。

现重点讨论几个过去不大清楚的问题：

1.征大宛的时间表和一些基本史实

太初元年(前104)秋出发。“属国骑六千”，仍然是张掖属国胡骑，即赵破奴所率、击楼兰之后留驻张掖、敦煌、酒泉，贰师出征复率之。值得注意的是王恢作向导。元封元年，恢以故中郎将率军助赵破奴，四年封浩侯，仅一个月就“坐使酒泉(郡)矫制害当死，赎罪免”。(见汉书武帝功臣表，史记大宛传集解作一年)赵破奴元封三年封浞野侯，约继续驻军河西西部。太初元年不明。二年初贰师败归，夏天破奴率骑2万出朔方2000里击匈奴被围覆没。这次出击显然是为配合贰师西征的。

二年春，征大宛败，贰师返回敦煌后，上书：“愿且罢兵，益发而复往。天子闻之大怒，而使使遮玉门曰：军

有敢入者辄斩之。贰师恐,因留敦煌。”沙畹的理解有死读书之嫌。原文明白显示:天子不是不准入关,而是不准东返长安“益发而复往”,即不准公开承认失败。贰师返敦煌即上书待命,使使遮玉门即遮敦煌。贰师本欲东返,因此才留敦煌。历史真实如此,史迁之含蓄亦如此,故读史不可“认真”过度,致导向歧误,更无从考稽。

二年春至三年夏,天下骚动,人马不断集结敦煌并陆续西出。三年秋,贰师率精锐后出,一路披靡。三年底,大宛降,四年春,军胜返回。《汉书·功臣表》李广利等太初四年四月封侯,战争结束当在二、三月。

此战汉军以强击弱。出征时边骑、材官、恶少年、免徒和私随从10余万以上,50余校尉,马牛驴驼10余万,天下七科谪徒转输粮糒。但孤军深入并无同盟。三年天子诏乌孙发兵合击,乌孙派出的2000骑始终未参战。又仑台、宛城、郁成遭遇拼死抵抗,伤亡惨重。“军还入玉门者万余人,马千余匹”,损失9/10以上。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特别指出贰师两次出征皆“后行”,即率精锐大军殿后。又其士卒因“将吏贪”而死亡特多。

2. 关于向盐泽西域修筑亭燧线

《大宛列传》叙太初四年四月奖赏伐宛将士,天汉元年宛贵人杀亲汉之王又立新王,“因使使赂赐以镇抚之”,复遣使十余批使大宛以西诸国、宣扬伐宛威德后,写道:“而燉煌置酒泉都尉,西至盐水,往往起亭。而仑头有田卒数百人,因置使者,护田积粟,以给使外国者。”

有研究者对此或作机械理解,主张天汉元年以后始由敦煌向盐泽起亭。实际上,亭燧作为道路标志、邮驿机构和烽火哨卡,早在元封元年出击楼兰、姑师前就应开始建设。敦煌至盐泽的亭燧线,不会晚于元封元年至太初元年。“而”是转折语,相当于“同时”。西至盐水,往往有亭,不是正在进行式,而是既成事实。陈梦家指出,“燉煌置酒泉都尉”应作“敦煌、酒泉置都尉”,乃传抄刻印之讹。仑头有田卒云云,可定为太初三年秋贰师破仑台以东捷枝、渠犂、尉犂、危须、焉耆诸国,初设使者校尉、吏卒屯田事,亦即后来西域都护的雏形和前身,地当西域中道。赵破奴所破姑师,后分置为车师前、后国,当西域北道。

斯坦因、黄文弼在罗布泊东北、罗布泊西北孔雀河沿岸,及再西北的库车、车师以北等地,均发现汉晋烽燧遗址,线路主要是连通敦煌和西域都护府的。其中罗布泊以西,约属汉武帝以后修筑。

3. 征大宛的路线与玉门、阳关

《汉书·张骞李广利传》记述西域交通较《史记·大

宛列传》稍详。大宛贵人闻汉军将来伐,“相与谋曰:汉去我远,而盐水中数有败,出其北有胡寇,出其南无水草,又且往往而绝邑”。这是关于出敦煌以西的中道(楼兰)、北道(车师)、南道(且末、于阗)的最早历史记述,是西域人的认识。

首次征宛出玉门行中道,学界又称楼兰道,过白龙堆、盐泽,经楼兰及以西尉犂诸小国,沿塔里木北缘西行至郁成(吉尔吉斯斯坦乌兹根)而罢兵。二次征宛,“起敦煌西,为人多,道上国不能食,分为数军,从南北道,校尉王申生、故鸿胪壶充国等千余人别至郁成城”,“贰师令搜粟都尉上官桀往攻破郁成……王亡走康居,桀追至康居”。大军至“轮台,轮台不下,攻数日屠之”。“自此以西,平行至宛城”。同上《西域传》渠犂条“李广利伐大宛,还过杆弥”和龟兹。由知军分数路,玉门、阳关和北道、南道并举,北道即本文所谓中道。而李广利从中道西进,直取大宛都城贵山(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北,卡桑赛)。此前,曾分兵一路进攻郁成。后又分攻宛军一路往攻郁成并追击至康居(中亚锡尔河流域)。大宛降,汉军东返同西征时路线。杆弥在今新疆塔里木南之于田,龟兹在天山南麓库车,分属南道、中道。

以上中道、南道都是由汉武帝时开通并大规模实践的。北道最早,元封初征姑师、楼兰时开通。北道、中道出玉门。南道据征大宛史实也不晚于太初年间,所出当为阳关。中道、北道的路线有时变迁。如《大宛列传》载:“太初三年诏军正赵文出玉门从便道袭楼兰。”汉书《匈奴传》、《西域传》载:天汉二年李广利从酒泉塞西北出击天山,开陵侯成娩率楼兰兵攻车师,征和四年莽通出酒泉过车师北击匈奴,等等。南道阳关道的路线则相当稳定。总之,西域三十六国从此与汉建立了政治、民族的藩属关系。西域三道和敦煌两关成为中国交通世界的国道、国门。

五

研究西域、两关交通,又以下诸点异同为前贤所未道及,今姑妄言之,以抛砖引玉。

前述长安经高平道(北道)、关陇道(南道)连河西道的官驿大路,过敦煌而西的终点为龙勒、阳关而非玉门。这种情形或发生于汉武帝以后。据悬泉置出土的昭宣时期或更晚的驿置文书简,贯通敦煌郡境内的官驿大道置站,由东向西共有八站,即:渊泉—冥安—广至—鱼离置—悬泉置—遮要置—敦煌—龙勒、阳关。汉敦煌郡六县,有五县位于驿路大道,均设县置。但广至县至敦煌路途甚远,中间加设三置。效谷县有置,但不

当大道,约位于遮要、悬泉置以北的驿路支线上。玉门关在敦煌西北,从敦煌经中部都尉塞防有道路可达,约也属支线,简牘中少有驿置交通往来的记载。敦煌市博物馆2000年在小方盘城(斯坦因T14)获木简有“玉门置”字样。^②而经敦煌过龙勒、阳关出入西域的驿置交通,络绎不绝,盛况空前。阳关是官驿大道,玉门则为支线,二者在交通、地理上甚有区别。此为其一。

《汉书·西域传》叙西域诸国及道路关隘,首云“出阳关自近者始曰婼羌”,先从阳关、南道起,后述北道诸国(包括中道)。郑吉率军骑使护西域,先护鄯善以西南道诸国,后护北道车师等,始称“都护”。此为其二。

述西域各国位置、距离和交通道路,皆以长安、阳关、都护治所方向、基准而不言玉门。即是距玉门关很近的国家如尉犁、焉耆、危须和天山东的车师、蒲类等也不例外,如西域都护、婼羌、鄯善、乌秣、大夏五翎侯、康居五小王国等,至阳关皆标有具体道里,西域都护至阳关2738里,乃分段详测、累计计算的结果而非约数。其他无至阳关道里数者,可据其距长安、都护治所道里计算测得。由此可知,西域交通网络与干线中,诸国不论南北,均已建立以长安、阳关、都护治所为中心和枢纽的交通体系。在西域与汉的交通中,阳关道为主,玉门道次之,此其三。

悬泉简置驿记录所载交通实例,西域北道之国也进出阳关。例如简I.T0309^③:20记,“乌孙,莎车王使者四人、贵人十七”,同批同簿出入。莎车国在南道,而乌孙居北道以西极远。又简II.T0114^③:522记,甘露三年十月朝廷遣丞相史迎乌孙公主归汉,入阳关过龙勒县。又晋法显西行求法,出阳关至鄯善,西北赴中道焉耆、尉犁,又南去于阗,由见阳关联系南、中道和部分北道国家的交通情形。此其四。

由所知历代过两关记载看,过玉门关者少,多为军旅战争,关址和路线多变;过阳关者,多政治、文化、商旅活动,一直延续至唐末、宋初,道路、关址稳定。魏晋以后玉门关与道路移至瓜州—伊吾。西汉悬泉简I.T0309^③:134记,“于阗王以下千七十四人,五月丙戌发禄福,度用庚寅到渊泉”。足以令人相象阳关大道上“车如流水马如龙”的繁荣景象。玉门道东端近匈奴,又多战争,故玉门关之运营不如阳关兴盛,此其五。

汉时由两关通西域,并非玉门专管北道而阳关专管南道。《汉书·西域传》云:“自玉门、阳关出西域有两道,从鄯善傍南山,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……自车师前王庭随北山、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。”(按即中道)又乌弋山离条:“自玉门阳关出南道,历鄯善而南行

至乌弋山离,南道极矣!”《后汉书·西域传》东汉安帝元初时,“北虏连与车师入道河西,朝廷不能禁,议者因欲闭玉门、阳关以绝其患”。又“自敦煌西出玉门阳关,涉鄯善北通伊吾千余里……自鄯善逾葱岭出西诸国有两道”。“出玉门经鄯善、且末、精绝……至拘弥。”《三国志·魏志·乌丸传》注引魏略西戎传:“从敦煌玉门关入西域,前有二道,今有三道。”下述三道皆自玉门出,西经若羌入大月氏为南道;西出都护井,居卢訾、楼兰、龟兹为中道;西北出车师戊己校尉高昌西接龟兹为北新道。《魏书·西域传》出西域四道,其中两道皆自玉门出,一至车师,一至鄯善。《隋书·裴矩传》自敦煌出西域凡三道,北道从伊吾,中道从高昌,南道从鄯善西行,诸国“各自有路”,“伊吾,高昌、鄯善并西域之门户也,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”,不复言出入两关,以总凑敦煌代替。总之,《汉书》、《后汉书》言出西域时,玉门、阳关总是并提,即由两关之中任一出发,皆可至鄯善南道或车师北道。后书明言鄯善(楼兰)可通伊吾、车师、龟兹、于阗。是两关以西,楼兰亦一枢纽之地。《三国志》合并两关而独称玉门,西域三道皆自玉门发,其玉门包含阳关,二者是一。北魏同之,言玉门等于说两关。由此可见,玉门、阳关虽分置二地,但其出西域之路,除各自的便捷路向,如玉门至伊吾,阳关至若羌以外;两关以西,应有一段道路是同一的,即楼兰道,既可向北,也可走南道。出两关的去向,可由之得到调整。其次,西域诸国之间互有交通联络,进入两关的路线比较灵活,不是一成不变。再次,因形势、地理不同,两关担当略有区别,即前述玉门多军用,阳关多各国交流。因此,两关与南、中、北道的关系不可机械理解。此为其六。

《汉书·西域传》婼羌去阳关1800里,去长安6300里;鄯善去阳关1600里,去长安6100里。此二例演算结果长安至阳关4500里。我曾据汉简提供的驿置道里数,计算长安经南道(天水、金城、武威)至阳关为4389里(汉里约为今415.8米)。由知西域传所有国家距长安里数中长安至阳关的一段,是依据关陇道(南道)路线的里程计算。岑仲勉断言西域传婼羌、鄯善去长安之6300里和6100里,皆误增1000里,应当作5300里和5100里。其误在以汉里比唐里而未换算,唐里大于汉里,而《汉书·西域传》全部里程皆汉里。又计得长安经北道(即固原、武威)至阳关为3997汉里,比南道近400汉里,不知为何不以北道里数计算西域各国至长安距离?此其七。

以上七点,是在研究两关时逢到的一些值得思索的问题,时限主要在武帝以后的昭宣时期直至西汉末。

[注 释]

- ①五行方位,东方为木,南方为火,西方为金,北方为水,中央为土。《汉书·百官公卿表》戊己校尉条颜师古注:“甲乙、丙丁、庚辛、壬癸皆有正位(按:即东西南北四方),唯戊己寄治耳……一说戊己居中,镇覆四方。”徐松《汉书西域传补注》:“汉官仪厌胜之说为近。盖屯田校尉所以攘匈奴而安西域,西域在西为金,匈奴在北为水,戊己生金而制水耳。”黄文弼《罗布淖尔汉简考释》:“汉官仪称戊己中央之意颇为相近,盖戊己校尉直属中央之官。”
- ②向达译,斯坦因著:《西域考古记》,商务印书馆 1936 年版,第 118 页。
- ③本文关于《穆天子传》西征路线、地点的陈述,主要采纳顾实《穆天子传西征讲疏》、岑仲勉《穆天子传西征地理概测》的观点,予以综合取舍。此外也有作者的分析推测。
- ④中国古文献所载西方女首领部落即西王母,大多属于神话传说。比较可靠的,《汉书·张骞传》云骞出使大月氏,“大月氏王已为胡所杀,立其夫人为王,既臣大夏而君之”,是月氏又实行女王制,但此事过晚,地点在中亚南部。希罗多德《历史》记述中亚北部的斯基泰(塞族)马萨该塔伊人氏族部落,盛行女酋长女王制。波斯皇帝居鲁士与马萨该塔伊人作战时,被其女王杀死。
- ⑤认真探讨研究敦煌建郡以前的历史文化的论述为数不多,见褚良才《敦煌地理及历史沿革》,《敦煌学简明教材》,2001 年版。
- ⑥土名指地方原始的、旧有的,居民习用的地名。土名对后起的官定名称而言。
- ⑦岑仲勉:《释桃花石》,《东方杂志》33 卷第 21 号,第 68 页。
- ⑧伯希和:《吐火罗语与库车语》,《亚细亚报》,1934 年第 1 册,第 23~106 页,载《中国西部考古记吐火罗语考》,伯希和在讨论有关吐火罗、月氏、敦煌等中、外名称的对音时,特别强调“必须注重年代”是否同时。
- ⑨荣新江:《小月氏考》,《中亚学刊》,1987 年第 3 期,第 52 页。
- ⑩论者主要论据,为《史记·大宛列传》:“始,月氏居敦煌、祁连间。”此为史迁追述笔法。《汉书·张骞传》抄录之,曰:“天子数向骞大夏之属,骞既失侯,因曰:‘臣居匈奴中,闻乌孙王号昆莫,昆莫父难兜靡本与大月氏俱在祁连、敦煌间。’”《史记》无“本与大月氏”以下云云,乃班氏据意添加,变成张骞答对武帝之语。如此,则元狩时敦煌尚未建郡而张骞已知其名。方诗铭据此推断敦煌名称在元鼎六年建郡前九年即出现(《玉门位置辩》,《西北通讯》,1947 年第 1 卷第 1 期),而不知所据纯属子虚乌有,类似者还有《史记·大宛列传》河西、西域的一些汉式专名,如金城、河西、南山、西海、盐泽、盐水、洿水、大夏等。它们出现的准确时间,是张骞探险时的发现发明,还是攻占河西后的新命名,确实难以分辨。
- ⑪《睡虎地秦墓竹简》,文物出版社,释文第 88 页。《张家山汉墓竹简》,文物出版社 2001 年版。
- ⑫注⑩方诗铭文转引藤田丰八著、杨炼译:《月氏故地与西移年代》,《西北古地研究》,商务印书馆,第 91 页。
- ⑬本文敦煌建郡年代说九家,主要依据刘进宝《敦煌学述论》,甘肃教育出版社 1991 年版,第 9~10 页。因对诸家说未作具体讨论和引述,故其出处请看前书,此不再赘引。
- ⑭法·沙畹:《斯坦因在东土耳其斯坦所获中国文书考释》,剑桥版 1913 年版。
- ⑮⑯⑰岑仲勉:《汉书西域传地里校释》,中华书局 1981 年版。
- ⑱王北辰:《古代居延道路》,《历史研究》,1980 年第 3 期。
- ⑲吴初骧:《河西汉代驿道与沿线古城小考》,载于中国社科院简帛研究中心《简帛研究(二〇〇一)》,广西师大出版社 2001 年版。
- ⑳王宗维:《汉代祁连山路考述》,《西北师院学报》,1983 年第 3 期;《论霍去病在祁连山之战》,《西北大学学报》(社科版),1982 年第 3 期。
- ㉑据破城子出土简 EPT59:582(载《居延汉简》,文物出版社 1990 年版)、敦煌悬泉简 T0214①:130(载《敦煌悬泉汉简释粹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年版,第 56 页)。
- ㉒初世宾:《汉简长安至河西的驿道》,载于中国社科院简帛研究中心《简帛研究(二〇〇五)》,广西师大 2008 年版。
- ㉓陈梦家:《汉武边塞考略》,《汉简缀述》,中华书局 1980 年版,第 205 页。
- ㉔河西走廊,今多从武威向西计算。实则武威以东,由古浪向东至景泰、靖远黄河,南有祁连山脉冷龙岭、乌鞘岭、毛毛山等雪山延续,北为腾格里沙漠,中间夹持绿洲连串,西接武威盆地,东抵河,与武威以西贯通一气,也是名副其实的“河西走廊”。
- ㉕吴初骧:《河西汉塞调查与研究》,文物出版社 2005 年版,第 17 页。
- ㉖陈梦家:《河西四郡的设置年代》,《汉简缀述》,中华书局 1980 年版,第 187 页。
- ㉗张维华:《汉河西四郡建置年代考疑》,《中国文化研究丛刊》,1942 年第 2 卷。
- ㉘承敦煌博物馆付立诚馆长告诉。